

乡村遗产是一个文明时代的缩影。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都是在经过农业革命——包括由其引发的畜牧革命之后，才实现食物自给、人口增长并逐步步入文明社会，但在快速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过程中，作为农耕文明载体的乡村的凋敝已经无可挽回，纯正的农耕乡村正变得日益稀缺，成为渐行渐远的模糊记忆，数千年间积累的乡村遗产迅速解体、消失，保护甚至抢救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乡村遗产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中国是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地区之一，形成了最庞大、持续的农耕文明体系，也因此而形成了最丰富、系统也最具代表性的乡村遗产，因此各类中国乡村遗产堪称是宝贵的农业时代文明的活化石之一。

但是，中国的乡村遗产相对来说保存难度大、观赏性差。这既与中国乡村遗产的主要代表——乡村建筑的土木结构等特色有关——它们相对于某些农耕文明的砖石为主的建筑寿命更短，也与中国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有机更新存在方式以及当下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步伐有关。但是，这不是妨碍我们保护和利用乡村遗产所包含的丰富的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人文多样性的原因，反而对保护的紧迫性和利用的创新性提出了具有相当难度的新要求。

生态博物馆应该是保护和利用乡村遗产、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有效工具之一。在自然环境优美、人文遗产资源相对富集的乡村，建设乡村生态博物馆是可予考虑的兼具保护与发展的选项之一。

博物馆是保用人类遗产尤其可移动性遗产的有效工具，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革命，是新博物馆运动的启蒙者和重要代表。它由法国博物馆学家里维埃(Georges-Henri Riveire)和戴瓦兰(Huguesde Varine)于1971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上首次提出并率先在法国开展实践探索，而其出现与1960年代法国的学生运动、社会思潮变化、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运动、土著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觉醒与表达，以及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的兴起等密切相关。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意国际博物馆协会以“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为题在智利圣地亚哥组织召开博物馆圆桌会议，对博物馆界应对变革的探索进行理论反思和概括，其议题之一就是“博物馆在今天拉丁美洲的角色”。会议认为应该扩展博物馆的包容性和参与性，希望博物馆能够参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从规划师、建筑师到每位市民均可以博物馆为平台讨论、交换知识及想法的“整合性博物馆”概念，并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这次会议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国际博协在1974年第十届大会上将“服务社会及其发展”的制度性表述写入新的博物馆定义中，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定义，并引发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等多种类型的整合型博物馆的产生和探索。

其中，生态博物馆一改传统博物馆将藏品收进库房、经过博物馆化处理后在展厅中进行展示以向公众传播其历史、科学、艺术与文化等信息和价值的做法，将博物馆移出围墙之外，置身于社区及其环境场域之中，将一个地域和社区中的自然与人文遗产进行整体性、在地化、活态化的保存和展示，将保与用、藏与展、自我存续与开放服务等功能诉求融为一体，探索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贯通性发展的新路径。生态博物馆的这种在地性、社区性、有机性、关联性以及活态性、在现场和在脉络中等特征，使得它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对藏品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保存和展示以及社会服务方式，具有遗产信息和公众参与体验甚至互动等多方面的优势，从而从更多维度反映和完善了遗产与人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当然不是乡村复古——农耕文明作为一种优势性的文明形态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要以工业、信息产业、服务业等新经济反哺农业，以现代文明兼容历史文明成果，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使他们也能够搭上发展的时代快车，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只是农业或者传统小农经济的农村，而应是多样化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化一直具有反向兼容的特性，在采猎-农牧-工商-信息-生态文明的迭代发展中，后一业态超越却并不必然取消前一业态，而是在更高的科技与生产力水平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为其创造一种镶嵌式与整合式的发展进阶。中国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连续发展的超级复合型文明体系，在快速工业化与迈向信息化、生态文明新阶段时，更应该自觉选择具有重要历史与生态价值的农耕文明遗产加以保护和创造性利用，助推创新性发展。

在更具兼容性、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中，关键是要着力处理好生态-业态-心态的三态关系。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业态的反向兼容、丰富多样与高效合理，必须建立在包括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系统的支持与承受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理性的系统性全面认知价值支撑的良好心态的匹配之下。在新时期国家“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中，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应具有统领性作用。

生态博物馆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博物馆发展新探索，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为焦点的满足多方面利益需求的协调性和持续性方面的难题，包括围绕当地民众的发展权利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因此，中国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博物馆探索应在尊重遗产采用的基本原则、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的协调性优势前提下，注重维护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权益，坚持不打折扣地强化对乡村遗产的系统梳理与科学保护，不断完善价值挖掘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开放兼容的新型遗产展示和利用方式，尤其是注重遗产的乡土性及其脉络化延展与语境化迁移，鼓励创新型利用和创造性转化，突出乡村遗产的活态性特征，以形成以原真性为前提的信息叠加、信息链延展和跨文明形态传播互鉴的优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生态博物馆建设应充分体现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二真性——遗产本体原真性和文化信息真实性——在严格的真实性基础上生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知识和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与生态博物馆必需的协调性与持续性。就遗产与人的关系来说，在乡村振兴与生态博物馆建设运营中应该探索合理的实践主体，解决好谁之遗产、谁有文化阐释权、处理好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中的文化代理人与文化主人的关系、发挥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与发展的对话平台作用，实现自然与人文遗产价值最大化，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主体与本体论，破解以往生态博物馆建设和运营中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理论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保护落后与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博物馆文化本身就是基于传统却面向未来的一种新型文化，它兼顾历史现实与未来，演奏海纳百川的复合型物人关系交响曲。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乡村遗产保护和乡村振兴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将数千年积累的优秀乡土文明成果带入未来的生态文明的有效手段之一。期待在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和乡村遗产保护与传承实践中，能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博物馆的中国之路和多样性方案。

(图片:六枝特区政府网、锦屏县文广旅局微信)

生态博物馆与乡村遗产保用及乡村振兴

曹兵武



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蜡染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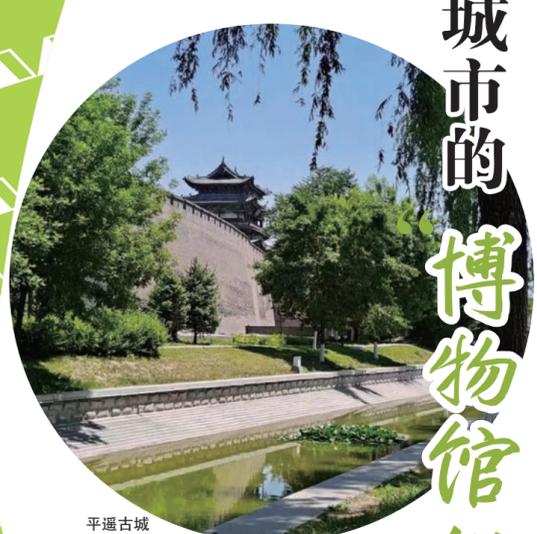
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



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织布机



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



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镖局



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



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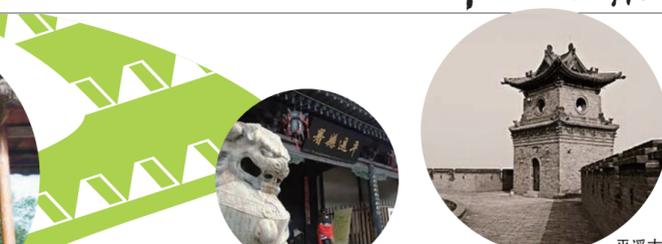
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



平遥古城古街

平遥古城

“全域旅游”与城市的“博物馆化”

张颖岚 李荣炜

2021年,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秉承新发展理念,将博物馆事业主动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2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了新时代文物工作22字方针,其中的“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对文物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对于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藏品资源被不断激活,阐释传播转化不断丰富,中国的博物馆正在成为新的发展动能,在推动文化软实力提升、促进社会发展繁荣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与此同时,随着文化新需求、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以及疫情后旅游业的迅速复苏与快速发展,文化旅游也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鉴于此,我们拟以进一步拓展思路,借鉴与引入博物馆、旅游、城乡规划等不同领域的理念与思路,以博物馆“融合发展”为突破口,以“全域旅游”为着眼点,思考如何借由城市的“博物馆化”发展路径,使博物馆在馆城融合、文旅融合、产业融合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何谓“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旨在发挥旅游产业的杠杆放大效应与对经济社会的牵引驱动作用,通过对一定区域内人文和自然环境、文化和旅游资源、交通和服务产业、政策与体制机制,以及价值转化形式和产业培育路径等的系统梳理评估与调整优化提升,从而形成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以统筹协调、精细高效、开放融合、共建共享为发展思路,以“资源—产品—产业—经济—社会”为发展路径,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创新发展模式。

这一概念相较于狭义上的传统“旅游”,最显著的特点是增加了“全域”这一空间维度,将一个区域作为功能完备的旅游目的地进行整体建设,通过“旅游发展全域化”,“构建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放心旅游消费环境,实现全域宜居宜业宜游”,进而促进区域内的产业联动、要素整合、全民参与,以旅游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强调区域空间的“全域”概念最早出现在城乡规划领域,并随即拓展至旅游行业,成为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热点话题。2010年开始,一些地方性的旅游规划中就开始提出“全域旅游”“全域旅游”等发展模式;2016年的全国旅游规划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全域旅游”思维引领新时期旅游规划发展;2017年“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被列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工作任务,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做出全面部署。从试点探索到理论研究,从政策指导回归实践应用,在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探索的双重驱动下,“全域旅游”不仅是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路,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

“全域旅游”这一思路对文物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于一些具有文化资源禀赋优势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全域旅游”可以为一个区域、一座城市的文物保护利用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盘活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资源潜能,并通过保护传承与有效利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什么是城市的“博物馆化”

博物馆学研究语境中的“博物馆化”,一般认为是捷克博物馆学家斯贝尼克·斯坦斯基所提出的,可以理解为是人对物的一种独特认知与态度,其本质是将“物”从现实时空中抽离出来,使之转变为“博物馆物”。而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城市“博物馆化”,则更注重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简而言之,城市的“博物馆化”就是以“博物馆”式的人文关怀,保存城市的历史温度,赋予城市当下以温暖,拓展城市的未来发展。

这一理念在现实中的部分映射,就是现在经常被提及的“博物馆之城”“博物馆之都”“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等。城市的“博物馆化”,就是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与思考博物馆和城市的联系,既注重博物馆的提质增量,并基于博物馆的内部建设与外部作用,充分发挥博物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更重视博物馆与城市发展的有机互动,运用“博物馆化”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的发展现状、规划布局与未来目标,在城市有机更新中给予“博物馆”式的人文关怀,以提升城市中“人”的具身体验。

以“博物馆化”这一理念思考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有多重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以“博物馆化”看待城市的过去,可以让我们更加珍视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将一座城市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作为保存人类创造力与历史记忆的“时间胶囊”与“活化石”,记录城市成长的“年轻”与“足迹”。

其次,是用“博物馆化”的思维,挖掘凝练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资源潜力,将城市里的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乃至书店、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等城市公共空间,都转化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知世界万千气象的“课堂”,使市民拥有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获得感”。

第三,将“博物馆化”理念融入城市的空间规划与建设,用历史积淀与地域禀赋的文化特质,赋予城市冷硬的物质形态以具有温度和魅力的“文化气质”。譬如罗马在城市建设中所塑造的全域文化空间,使城市的街角巷尾和随处可见的文化景观都彰显出其“永恒之城”的独特气质。

第四,通过对城市“文化层积复合情境”的保护挖掘和“博物馆化”的阐释转化,可以建构起城市居民的“乡愁记忆”和归属感,使城市成为人们情感依托的“精神故乡”,并进而构建起一座城市汇聚人才与资源、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支点。

“全域旅游”与城市“博物馆化”关系之探讨

“全域旅游”与城市的“博物馆化”都是基于空间维度的全局性、系统性宏观发展理念。二者之间的关注点、发展思路与实现路径虽各不相同,但又相辅相成,彼此联系。“全域旅游”强调全域统筹规划、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是城市“博物馆化”的资源转化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之一;城市的“博物馆化”强调保存历史文化记忆,挖掘遗产资源潜力,赋予城市文化气质和吸引力,是“全域旅游”的立足点之一,也是其发展目标的重要实现方式。

“全域旅游”对城市“博物馆化”的有益借鉴。“全域化”是“全域旅游”的最显著特点,其重点就在于“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凝聚全域旅游发展新合力”,这种全域化的理念对于我们思考城市的“博物馆化”有着积极作用。在城市的“博物馆化”中引入全域观念,可以突破博物馆的单一思维,从城市整体空间维度思考博物馆的布局规划、建设发展,以实现从相对独立的博物馆体系向更加开放的“馆城互动”转变。

“品质化”是“全域旅游”对旅游产品供给的总体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通过“增加创意产品、体验产品、定制产品,发展融合新业态,提供更多精细化、差异化旅游产品和更加舒心、放心的旅游服务,增加有效供给。”而城市的“博物馆化”,同样也需要用博物馆式的文化禀赋,让城市在发展中避免趋同化、低美感和人居环境不友好,以更高的发展质量与文化品质去规划布局与建设。

“融合性”是“全域旅游”的重要关注点,通过旅游与城镇化、工业化和商贸业,以及与农林、水利、交通、环保、教育、文化等各个行业的融合发展,其目标是“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转变”。城市的“博物馆化”也要以融合发展的思路探索“博物馆+”模式,通过“馆—校”“馆—企”“馆—媒”“馆—社”联动共赢促进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依托博物馆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双赢,并推动博物馆之城建设与城市发展规划、有机更新、空间转型、产业升级等紧密结合,形成“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城市“博物馆化”对“全域旅游”的积极作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价值挖掘是城市“博物馆化”的重要基石。从“全域旅游”的视角来看,通过城市“博物馆化”所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和当下创造,能够使地方文化特色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并通过对其进行多元化价值的挖掘,凝练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与历史风貌表达,进而提升全域旅游的文化内涵,增强一座城市的旅游体验吸引力。与此同时,在文化遗产价值挖掘的过程中,一些此前并未受到关注的遗产类型,甚至一些正在消失的遗产,也将会因为其所具有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转化价值而得到新的重视,并成为“全域旅游”的重要依托。

特色化与差异性也是城市“博物馆化”的发展思路之一。很多地方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分重视发展体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发展质量与品质。因而会出现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后,城市却变成了一个没有特点的地方。城市“博物馆化”,就是要通过对一座城市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貌等要素进行整体的梳理挖掘与阐释,由此提炼出一个地方的文化精髓,赋予一座城市以文化特色。而这些文化精髓与特色对于全域旅游“塑造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打造主题突出、传播广泛、社会认可度高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将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城市“博物馆化”的特点就是“活态”与“可感知”。一座具有优美生态环境与丰富人文气息的城市,也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园。以“博物馆化”的思维去保护、传承与延续城市的人文生态环境,既离不开城市中每一个“人”的共建,而保护传承的成果也将会成为城市居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产品。譬如说,平遥、丽江等古城的“博物馆化”,其吸引力与价值依托就在于它们是活态与可感知的,而这些重要的文化特质如果因为商业资本的逐利而日趋褪色,发展“全域旅游”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点。运用“博物馆化”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的发展现状,规划布局与未来目标,在城市有机更新中给予“博物馆”式的人文关怀,以提升城市中“人”的具身体验,是城市“博物馆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将使一座城市不仅成为“全域旅游”中的“旅游目的地”,也将会是居民与游客共建共享的家园。

(图片:丽江市政府网、平遥县政府网)